

阮堂明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天津 300073)

张旭卒年考辨

[摘要] 张旭卒年, 史无确载。由于对相关资料理解、认识上的分歧, 学界围绕这一问题自来颇多异说。我们认为, 在纠缠于资料而难以确证的情况下, 考察张旭之仕履经过, 就成为确定其卒年的惟一可行的方法。由李颀的江东之行可知, 张旭在开元二十三、二十四年(735年、736年)之际结束常熟尉之职而赴京, 其任左率府长史, 约在此后不久。约在开元末年, 而任金吾长史。其天宝五载(746)退居洛阳时, 年初逾六旬。由此, 结合李白《猛虎行》所叙与张旭天宝十五载(756)三月在溧阳酒楼会晤之事, 和他《草书歌行》诗中“张颠老死不足数”, 我们认为, 张旭卒年应以乾元二年(759)为是。张旭《千文》末“乾元二年二月八日”之注, 应是张旭所书。

[关键词] 张旭; 卒年; 考辨

[文章编号] 1672-2035(2004)04-0102-05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张旭为唐代著名书家与诗人, 素有“草圣”之誉。或因官位未显, 《旧唐书》中并未为张旭立传。《新唐书》虽为其立传, 也只是将其附录于《李白传》之后, 且所记非常简略, 仅说张旭为“苏州吴人, 性嗜酒。……初仕为常熟尉”《新唐书》卷二二), 余皆未详。故有关张旭的生平事迹, 我们所知甚少。唐人著述中言及张旭之生平事迹者, 也极为有限。张固在《幽闲鼓吹》中记云:“(张)旭释褐为常熟尉。”(转引自《太平广记》卷二八)窦蒙在《述书赋》中注谓:“张旭, 吴郡人, 左率府长史。俗号张颠。”《全唐文》卷四四七)颜真卿《张长史十二意笔法记》一文(《全唐文》卷三三七), 在记述自己向张旭学书的经历时也说:“予罢职醴泉, 特指东洛, 访金吾长史张公旭, 请师笔法。长史于时在裴傲宅憩止已一年矣。”以上这些极简略的记述, 是我们现在所能了解到的关于张旭生平的主要的情况。关于张旭的卒年, 以上诸书均未作记载, 可见这一问题, 至少从宋代起, 人们对此已模糊不清。目前围绕张旭卒年, 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是认为张旭卒于天宝六、七载(747年、748年)(详情请参阅詹续

先生《李白诗论丛·李诗辨伪》,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一则认为张旭卒于乾元二年(759)(详情请参阅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第241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①前一种说法主要依据苏涣《赠零陵僧兼送谒徐广州》一诗。在这首诗中, 苏涣这样写道:“张颠没在二十年, 谓言草圣无人传。”由苏涣此诗作于大历二、三年(767年、768年)之际(这一点可由徐浩大历二年二月由工部侍郎改迁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史而考知)而逆推二十年, 故以为张旭卒年在天宝六、七载(747年、748年)。而后一种说法则据宋代无名氏《宝刻类编》卷三所收张旭书《千字文》末“乾元二年二月八日”之注, 而认为乾元二年(759)二月时张旭尚在世。既如此, 双方又是如何看待对方的观点的呢? 主前说者, 以张旭书法在宋代颇多伪作为据, 认为《千文》后“乾元二年二月八日”之注不足信从; 且即便《千文》为张旭真迹, “乾元二年二月八日”也或当为刻碑时间, 而未必是张旭所书时间。主后说者则认为苏涣《赠零陵僧兼送谒徐广州》中“张颠没在二十年”句很不像诗句, 并以诗中“琅诵□句三百字”一句夺去一字为

[收稿日期] 2004-06-20

[个人简历] 阮堂明(1964-), 男, 安徽长丰人,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① 除这两种说法外, 还有以张旭卒于天宝九载(750)者。此说见王启兴《贺知章、包融、张旭、张若虚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及莫砺锋《唐诗大事年表》(周勋初先生主编《唐诗大辞典·附录》,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由于这种说法有断无, 故无以讨论。然此说也以张旭卒于天宝十载前, 故颇近似于第一种观点。

据,而认为苏涣诗当有蠹蚀,进而指出“张颠没在二十年”一句应为“张颠没世已十年”之蠹蚀残文,如此则文从字顺,而可推出张旭卒年在乾元二年(759)。双方还基于对张旭卒年的不同认识,而对李白《猛虎行》一诗之真伪加以争论。因为李白此诗中有安史之乱后在溧阳酒楼与张旭会见的内容。主张旭卒于天宝六七载间者,故认为《猛虎行》系伪作,而主张旭乾元二年始卒者则否认《猛虎行》为伪作。因此,考察张旭卒年对于辨别李白《猛虎行》之真伪,也具有重要意义。

那么,两种观点中究竟哪一种错误,哪一种符合事实,或者二者皆误呢?在没有版本依据直接确认苏涣《赠零陵僧兼送谒徐广州》诗有无蠹蚀,同时也难以确认张旭《千文》是否可靠,文末“乾元二年二月八日”之注究竟是张旭所书时间,还是刻碑时间的前提下,我们要考察张旭卒年,显然就不能再以苏涣诗及张旭《千文》“乾元二年二月八日”之注为主要依据了。在我看来,要解决这一问题,惟一的途径和办法是考察张旭仕履及其生平实际。

我们从上引张固《幽闲鼓吹》等资料可以知道,张旭一生历任过常熟尉、左率府长史、金吾长史之职。另外,从颜真卿《张长史十二意笔法记》一文中,我们还可以知道,张旭是天宝五载(746)时退居洛阳的^①。那么,我们能否考知张旭任常熟尉的时间呢?对于这一点,虽然史无确载,但从与张旭有过交往的李颀的诗中,我们还是可以窥探到些许消息的。李颀有一首诗——《赠张旭》。这首诗这样写道:

张公性嗜酒,豁达无所营。皓首穷草隶,时称太湖精。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下舍风萧条,寒草满户庭。问家何所有,生事如浮萍。左手持蟹螯,右手执丹经。瞠目视霄汉,不知醉与醒。诸宾且方坐,旭日临东城。荷叶裹江鱼,白瓯贮香粳。微禄心不屑,放神于八纒。时人不识者,即是安期生。

李颀这首诗,在考察张旭生平时过去一直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其实,认真考察此诗作年,对于认识张旭的生平有着重要意义。今按,这首诗既题作《赠张旭》,而非《寄张旭》,可见是李颀与张旭见面时所作。对照张旭一生仕历经过,这首诗中“微禄心不屑”一句中的“微禄”,指张旭所任的常熟尉显然更为适当。也就是说,李颀此诗应是张旭任常熟尉时所作;而且诗中“诸宾且方坐,旭日临东城”中的“东城”,指的应该即是常熟。果如是,则李颀生平中应

有过江东之行才是。这从他的《赠张旭》诗中即可以寻到一丝线索——这首诗中“下舍风萧条,寒草满户庭”二句,直写耳闻目睹,分明是对张旭官舍的直观的描绘。因此,这首诗很有可能是他在江东所作的;否则,李颀何得而会有此言?此言又该作何解释呢?当然,仅凭这一首诗便说明李颀有过江东之行,还是远远不够的。那么,李颀诗中还有无其他的诗可以证明他有过江东之行呢?回答也是肯定的。虽然学界关于李颀生平的研究尚未揭示这一点,但从李颀诗中,我们是不难窥探到这方面的蛛丝马迹的。今按,李颀有《寄万齐融》一诗,诗云:“名高不择仕,委世随虚舟。小邑常叹屈,故乡行可游。青枫半村户,香稻盈田畴。为政日清静,何人同海鸥。摇巾北林夕,把菊东山秋。对酒池云满,向家湖水流。岸阴止鸣鹄,山色映潜虬。靡靡俗中理,萧萧川上幽。昔年至吴郡,常隐临江楼。我有一书札,因之芳杜洲。”按,万齐融,早年与贺知章、贺朝、包融、张若虚、邢巨等,俱以吴越之士,文辞俊秀而名扬上京,主要活跃于开元时期,《唐诗纪事·万齐融》即谓其“开元以来乐道之士”。他曾官昆山令。从“小邑”、“把菊”等词及诗中描绘的情形看,李颀此诗显然作于万齐融任昆山令时,时间当在天宝前期^②。这里,我们尤需注意的是“昔年至吴郡,常隐临江楼”二句,万齐融本吴越之人,其在昆山为县令,自有官舍可居,何以会隐于“临江楼”呢?因此,所谓“至吴郡”者,应是李颀自指,而不是指万齐融。另外,诗中之“临江”也非为泛指,而是吴郡名都。无名氏所编《吴地记后集》(无名氏《吴地记后集》,四库全书本)“昆山县十四都”中即有“临江”。李颀又有《送刘主簿归金坛》一诗,开头这样写道:“与子十年旧,其如离别何。宦游临故国,归梦是沧波。”今按,金坛为吴郡属县,与昆山为邻。李颀自说“宦游临故国”,也与《寄万齐融》中所写“昔年至吴郡”相合。从这里可以看出,李颀曾有过江东之游。这一点从李颀其他诗中还可进一步寻求到佐证。李颀又有《送刘昱》诗:“八月寒苇花,秋江浪头

① 据留元刚《颜鲁公年谱》,颜真卿“罢职醴泉”,前往洛阳拜谒张旭,时在天宝六载(747)。由颜文“长史于时在裴微宅憩止已一年矣”而推,可知张旭是于天宝五载(745)退居洛阳的。

② 李华《润州鹤林寺径山大师碑铭》尝记“故泾阳县令万齐融”为径山大师世俗弟子,据径山天宝十一载之卒年,故其任昆山令,当在天宝中期之前。又,万齐融《法华寺戒坛院碑》记元伊律师天宝三载卒,文中有“初律师凶问时,余忝外役”之语。这里,所谓“外役”,即是指任昆山令。

白。北风吹五两,谁是浔阳客。鸬鹚山头微雨晴,扬州郭里暮潮生。行人夜宿金陵渚,试听沙边有雁声。”这首诗前六句描绘临别景物,后二句推想友人途中所历情景。诗中之“浔阳客”者,指的即是“行人”——刘昱。从诗中“扬州郭里暮潮生”一句看,李颀是在扬州为刘昱西去送行的。李颀的《琴歌》一诗,也作于扬州。诗中有云:“主人有酒欢今夕,请奏鸣琴《广陵客》……清淮奉使千余里,敢告云山从此始。”这里,所谓“《广陵客》”及“清淮”者,就告诉我们此诗作于扬州。他的《觉公院施乌石台》一诗,也应当作于扬州。检,赞宁所撰《宋高僧传》之卷八有《唐润州竹林寺昙璀传》一文,记与昙璀交往者中有“广陵觉禅师”,意者李颀诗中之“觉公”即当是觉禅师。另外,李颀还曾游历金陵,写有《题璿公山池》诗。据《宋高僧传》卷十七《唐金陵钟山元崇传》一文,璿禅师乃金陵瓦官寺(唐时改名昇元寺)僧人。此诗既为题咏之作,显然作于金陵。再有,我们从他《杂兴》诗中“沈沈牛渚矶,旧说多灵怪”二句,也可推知是游历江东期间所作。牛渚矶,位于金陵之西,为长江要冲。祝穆《方輿胜览》卷十五《太平州·当涂·牛渚山》云:“牛渚山,在当涂县北三十里,山下有矶,古津渡也,与和州横江渡相对……”凡此种种,皆可以确证李颀曾游历江东。由此,我们前所推测的李颀《赠张旭》诗,是他游历江东,在常熟与张旭相见时所作,也自然就成立了。

既如此,张旭任常熟尉是在何时呢?从李颀《赠张旭》中“皓首穷草隶,时称太湖精”二句看,张旭任常熟尉时,其书法的名声已经很高。而据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序,开元初,张旭曾“数常于邺县,观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从杜甫诗序中我们可以知道,开元初张旭书艺尚未臻成熟,还处于书艺探索的时期。因此,张旭之任常熟尉,不可能在开元初往观公孙大娘舞剑器时,而应向后推延(作为吴郡人的张旭,其前往地属安阳的邺县,观公孙大娘舞剑器,或应即是他早年为谋求功名而游历两京期间所为),也就是说,张旭不可能是在开元初在常熟与李颀相见。那么,他们二人在常熟相见,或者说李颀的江东之行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呢?弄清这一问题,也需要从李颀的生平考察起。

据李华《杨骑曹集序》(《全唐文》卷三一五),李颀进士及第时在开元二十三年(735)。虽然其登第之前的事迹已渺然难考,但也并非毫无线索。今按,李颀进士及第后,有《缓歌行》一诗,曾叙及自己的身世经历,颇有助于我们考察其早年生活。诗中有云:“小

来托身攀贵游,倾财破产无所忧……结交杜陵轻薄儿,谓言可生复可死。一沈一浮会有时,弃我翻然如脱履。男儿立身当自强,十年闭户颍水阳。业就功成见明主,击钟鼎食坐华堂……早知今日读书是,悔做昨前任侠儿。”由诗中可知,他早年曾于两京广接贵游,任侠使气。约自开元十三年(725)始,闭户颍川,折节苦读,直至登第。而李颀在进士及第后,并未马上出任新乡尉。根据傅璇琮先生《李颀考》^①,他任新乡尉的时间大约在登第之后几年。这样,其游历江东的时间就存在两种可能:一是“闭户颍川”之前,二是登第之后未久^②。那么,两者之中哪一种更有可能呢?我们认为,应以后者为是。检,李颀有《题綦毋校书别业》诗。诗云:“常称挂冠吏,昨日归沧洲。行客暮帆远,主人庭树秋。岂伊问天命,但欲为山游。万物我何有,白云空自幽。萧条江海上,日夕见丹丘。生事非渔钓,赏心随去留。惜哉旷微月,欲济无轻舟。倏忽令人老,相思河水流。”这首诗是李颀在江东所作的。理由是,王维有《送綦毋校书弃官还江东》诗,而据殷璠《河岳英灵集》,綦毋潜里贯乃在荆南^③,王维诗既云綦毋潜“还江东”,说明他在江东置有别业,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綦毋潜》即是据王维此诗而说綦毋潜“挂冠归隐江东别业”。又,韦应物有《和李二主簿寄淮上綦毋三》诗,其中这样写道:“请报淮阴客,春帆浪作期。”这二句似乎告诉我们,綦毋潜之别业是在淮阴。卢象也有《送綦毋潜》诗。诗云:“夫君不得意,本自沧海来。高足未云骋,虚舟空复回。淮南枫叶落,灞岸桃花开……”这里所谓“淮南”,与韦应物诗中所云之“淮阴”所指正复一致。由此,我们认为,綦毋潜江东的别业应在“淮南”,具体而言,对照前引李颀《送刘昱》,或即在扬州。由此即可知道,李颀《题綦毋校书别业》一诗也是他游历江东时所作的。而另据顾况《监察御史储公集序》(《全唐文》卷五二九),綦毋潜进士及第时在开元十四年(726),因此其别业应在登第后购置。这样,我们首先即可排除李颀开元十三年(725)“闭户颍川”之前游历江东的可能。也就是说,李颀之游历江东,只能是他登第之后未久。那么,我们能否对其江东之游的时间作进一步的考察呢?今按,据《题綦毋校书别业》一诗的诗题可知,李颀作此诗时,綦毋

① 据傅璇琮先生《李颀考》,李颀开元末及天宝时期足迹未离长安、洛阳,而以洛阳为主,故不可能有江东之游。

② 可参考马茂元先生《唐诗礼丛·綦毋潜里贯仕履及其诗》,《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0月。

潜在校书郎一职上。那么他任这一官职又是在什么时候呢?我们认为,至少在开元二十三年(735)时,綦毋潜应已在校书郎任上。检,高适有《醉后赠张九旭》一诗,诗云:“世上谩相识,此翁殊不然。兴来书自圣,醉后语尤颠。白发老闲事,青云在目前。床头一壶酒,能更几回眠。”高适此诗,按照周勋初先生《高适年谱》^[2]中的说法,是他开元二十四年(736)在长安所作的,当时他在长安“与张旭、颜真卿等人游”。今按,周勋初先生系此诗于开元二十四年,可从,但认为此诗作于长安则未妥。考《旧唐书·玄宗纪》,唐玄宗自开元二十二年(734)正月至二十四年十月,一直在东都洛阳,这样朝廷也自然随迁到了洛阳。因此高适此诗应该是作于洛阳,也就是说,张旭当时也是身在洛阳^①。既然李颀此后不久即出任新乡尉,张旭又在洛阳任职,因此,李颀游历江东时在綦毋潜别业题诗,并与张旭在常熟见面,时间只能在开元二十三年(735)到二十四年(736)之间。陈铁民先生曾推测綦毋潜任校书郎大致在开元后期(参见《唐才子传·綦毋潜校笺》^[3]),据此来看,这一推断还可以再精确、具体一点。从《赠张旭》诗中“下舍风萧条,寒草满户庭”二句及《送刘昱》诗中“八月寒苇花,秋江浪白头”二句看,李颀游历江东,时间应当在开元二十三年(735)秋季。据上所考,至迟在开元二十三年秋,张旭尚在常熟尉任上,则张旭任此职,应在此前数年。^②从李颀《赠张旭》诗中“皓首穷草隶,时称太湖精”二句看,张旭任常熟尉时年事已较高,应已年逾五旬。

那么,张旭任左率府长史又是在什么时候呢?据前引高适诗已知,开元二十四年(736)时,张旭已身在洛阳,这至少说明当时张旭已不在常熟尉任上。因此,张旭应是在开元二十三、四年之际结束了常熟尉之任,并随后进京的。而从高适诗中“白发老闲事,青云在目前”二句来看,当时张旭似并未任官职,也就是说,他当时似也未在左率府长史任上,而是处于闲居状态,或者是张旭在结束任期而赴京,尚在候任期间而闲居无事的。果如是,则张旭之入长安,或即是因秩满未调而在罢职后做出的再谋出路之举。当然,所谓“闲事”,除了“闲居无事”之义外,也可指不紧不忙,也就是说,高适这两句诗也可以指张旭虽在左率府长史任上而公务又并不繁忙;而且,我们从高适诗中也看不到张旭失意甚或沮丧之态。因此,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即张旭在结束常熟尉任后而直接任左率府长史之职。但无论如何,可以确认的是,张旭之任左率府长史一职,都不会早于开元二十

四年(736)。据《旧唐书·职官志》,诸州中、下县尉为从九品下阶,而左率府长史为从七品上阶,金吾长史则为从六品上。可见张旭进京所任二职,较之常熟尉,官阶上是提升了。我们认为,张旭之获升迁,应是朝廷中有人举荐的结果,而最有可能引荐张旭的是他的友人——贺知章。理由有二:一是张旭与贺知章同为“吴中四士”,皆风流洒脱,卓尔不群,且彼此间有交往。《旧唐书·贺知章传》即有“时有吴郡张旭亦与知章相善”的话。宋代陈思《书小史》卷九曾谓贺知章“善草隶,尝与张旭游于人间”。这显然说的是他们早年之间交往的情形。另外,黄伯思《跋张长史帖后》(黄伯思《东观馀论》卷下,四库全书本)云:“贺八清鉴风流,千载人也。”沉吟此语,恍若季真在目。长史此帖,不独草圣可赏也!”仔细体会这几句话,其中“贺八清鉴风流,千载人也”,显然是张旭字帖中所书内容。由这两则资料看,二人是有交往的。二是据《旧唐书》本传,贺知章曾任皇太子侍读、太子宾客,而张旭所任官职,也正是太子左率府长史,因此具备举荐张旭的条件和可能。果如是,贺知章什么时候才可能举荐张旭呢?考察贺知章生平可知,他经陆象先荐引而任四门博士、太常博士,时在景云二年(711)至开元元年(713)间,故这时还不具备能力举荐张旭。开元十三年(725),贺知章迁礼部侍郎,加集贤院学士。开元二十六年(738),迁太子宾客。又考,宋无名氏《宝刻类编》卷三录有张旭《尚书省厅石记》,下书“开元二十九年”。按,此文应是张旭在左率府长史之任上所作。由此,结合前引高适诗,张旭任左率府长史,最早不过开元二十四年(736),最晚也应在贺知章任太子宾客之后不久。至于其任金吾长史,当在开元末,对此已不能详考。由此,设若开

① 《太平广记》卷二百一十二引《唐画断》云:“开元中,驾幸东洛。吴生(指吴道玄,引者注)与裴旻、张旭相遇,各陈所能。裴剑舞一曲,张书一壁,吴画一壁。都邑人士,一日之中得睹三绝。”根据高适《醉后赠张九旭》诗可知,三人相遇一事应发生在开元二十四年(736)。考《旧唐书·玄宗纪》,玄宗即位后,分别于开元五年、十年、十二年、十七年、二十二年共五次驾幸东洛。根据我们对张旭生平的考察,他与裴旻、吴道玄相遇洛阳,只能是开元二十二年(734)玄宗第五次幸洛阳时。

② 刘崇德先生《李白〈猛虎行〉、〈草书歌行〉新考》一文(见《文学遗产》1992年第3期),也曾考察过张旭生平,认为他开元初往邕县观公孙大娘舞剑器时,已在左率府长史之任上。果如是,则张旭任常熟尉之职更在开元初之前了;而且依此理解,则自开元初至天宝五载退职,张旭历任左率府长史、金吾长史时间竟长达近三十年,就情理来说是不大可能的。

元二十三年(735)张旭在常熟尉任上年初逾五十,则其天宝五载(746)退居洛阳时,年已在六旬之上。

由以上对张旭仕履所考,对于前引学术界围绕张旭卒年而展开的争论,我们可以进一步加以讨论。今按,李白有《草书歌行》诗,诗中有“张颠老死不足数”一句。这首诗是李白于乾元二年(759)所作的。由“老死”之称看,张旭死时年事已经很高。设若他卒于天宝六、七载(747年、748年)间,据上所考,则仅年逾六旬,应该说,这还远不足称“老死”。因此,张旭卒于天宝六、七载间之说,我们认为是难以成立的,其卒年应向后推延。而若以天宝五载(746)六十余岁后推,则天宝十五载(756)时,张旭七十余岁。乾元二年(759)时,又在七十五岁左右。应该说,这一年龄,称以“老死”,是较为适合的。这与李白《猛虎行》中所叙天宝十五载(756)春避乱南下而在溧阳酒楼与张旭相会之事,也是相吻合的。由此,我们认为,关于张旭卒年应以乾元二年(759)为是。郭沫若疑苏涣《赠零陵僧兼送谒徐广州》有蠹蚀而不足征信,我们认为是合乎情理的。既然如此,对于张旭《千文》之真伪,以及文末“乾元二年二月八日”之注,又当如何看待呢?我们认为,对于张旭《千文》及文末“乾元二年二月八日”之注,不能遽然予以否定。考,米芾《书史》有云:“唐垌处黄楮纸伯高《千文》两幅,与刁约家两幅一,同是暮年真迹。每辨六、七字,刁氏者后有李玉、徐铉跋,为人伪刻。”这里,米芾对张旭《千文》所作的辨别,对我们甄别张旭《千文》之真伪,具有重要的意义。米芾作为书法大家,识见精微超卓,他既已说“《千文》两幅”是张旭“暮年真迹”,则自可信从。尤其应当注意的是,米芾以《千文》为张旭“暮年真迹”,这与我们对张旭卒年所考正相一致。至于黄庭坚《跋翟公所藏石刻》所云“张长史《千

字》及苏才翁所补,皆怪逸可喜,自成一家。然号为长史者,实非张公笔墨。余中年来稍悟作草,故知非张公书,后有人到余悟处,乃当信耳”,以及《跋张长史书》所谓“张长史行草帖多出于贗作,人闻张颠,未尝见其笔墨,遂妄作狂蹶之书,托之长史,其实张公姿性颠逸,其书字字入法度中也”(黄庭坚《山谷别集》卷一,四库全书本),正如米芾所说“刁氏者有李玉、徐铉跋,为人伪刻”一样,只是说明张旭书法后世颇多伪托,但并不能说明张旭《千文》之不足信;恰恰相反,后世伪托张旭之贗作,正说明是模拟张旭而作的,也就是说,张旭《千文》在先,后人始进行模仿,进而以假乱真。因此,黄庭坚所言,并不足以否定张旭《千文》之可靠性。至于说《千文》后“乾元二年二月八日”之注难以确定是张旭所书时间还是碑刻时间,我们也并不认为能够成立。就常理而言,张旭作《千文》,在落款处不可能不署书写时间,在《千文》仅署“乾元二年二月八日”一个时间的情况下,我们应首先将其视为所书时间;况且与一般墓志、碑铭可能存在的铭文与刻碑时间有差异不同,碑刻《千文》,只是将张旭原文刻于碑上,不会在文末另加刻碑的时间。因此,文末“乾元二年二月八日”,应能确认为张旭所书时间。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张旭卒年应以乾元二年(759)为是,在他作完《千文》之后不久。也就是说,以他去世时年约七十五岁而推,其生年约在武后垂拱元年(685)或稍前。这样,对于张旭之生卒年,我们应可定为685?~759。●

[参考文献]

- [1] 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2] 周勋初,周勋初文集[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 [3] 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87.

【责任编辑 张琴】

Textural Researches on the Obiit Date of ZHANG Xu

RUAN Tang-ming

Literature Institute,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3, China

Abstract: There is no definite record on the obiit date of ZHANG Xu. Because of different views to materials, there are some divergence about the death dates of ZHANG Xu in Academic Circles. It is very difficult for us to get correct conclusion if tangling with those materials. But if we study on ZHANG Xu's life experience, we could discover that ZHANG Xu died in the year 759, as he completed his office in Changshu in between the years of 735 and 736 before going to the capital city for a new office, and the year 746, he retired to Luoyang at the age beyond 60. Later on in LI Bai's poem "Tour of Fierce Tiger" it is stated that ZHANG Xu met with him in a restaurant in Liyang in the year 756, and in his own poem ZHANG Xu wrote: "We die of no significance." In the "Thousand Characters", the note of "February eighth of Qiaryuan the second year" should be made by ZHANG Xu. Therefore, he must have died in Qiaryuan the second year or the year of 759.

Key words: ZHANG Xu; obiit date; textural researches